

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

*The Studies of Chinese Poetry
in the Interlingual Context*

韩 军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

*The Studies of Chinese Poetry
in the Interlingual Context*

韩 军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韩军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3950-5

I. 跨… II. 韩…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9465 号

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

©韩军 著

责任编辑:杨晓琴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2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125

版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2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时至今日，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面对这种情势，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便有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形态以及更为迫切的诸般任务。全球化与文化寻根的交错与冲撞，使我们既要警惕文化帝国主义那种单极文化的独霸，又必须深思如何遏止盲目自守、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对话与自我更新的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而在形成某种贯通中西、古今的研究视域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吸收和改造外来的文化与思想资源以使之成为中国文学与文化建设的有机成分，如何有效地将中国文学和文化推向世界以使之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以及如何在中外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来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等等，也都是亟需得到深入研究的课题；就此而言，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某种选择，就不仅要能够针对具体课题以“发之微妙”，而且也应该在此过程中“充之周遍”，以便在疆域、问题和方法等的拓展中获致自身的持续发展。“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酝酿和出版，就是希望能以上述当代学术意识作为贯穿，努力建设一方可供思考和对话的学术平台，旧学新知，赏奇析疑，使相关研讨可以从容、深入地进行下去。

在华中师范大学，聚集着一批挚爱文学、坚持探索和思考的学人。1979年，我校《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率先登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论文。30多年来，我们这个群体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建设一道见证成长。在长期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中，师生们对很多问题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所研讨的范围不仅包括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问题，而且力图立足于中国的文学现实，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生成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方法、我们的话语。这套丛书呈现的是近期研究的部分成果，其中有对我国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交流历史的探讨，有对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运用的轨迹的考察，还包括国外中国学研究和海外华裔文学的研究等等，问题探讨虽各有侧重，在比较中寻求学理的贯通与深入则是我们的共同之义。该丛书系列计划将来每年推出1至2本论著，以求教于同仁。

我们深知，比较文学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似乎构成了对人的智力的挑战，也惟其如此，比较文学才显得更有魅力。美国比较文学教授布洛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充满激情地说：“当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域都不会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恋。”在从事比较文学的过程中，我们对“人生苦短，学海无涯”这八个字有深深的体会。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之畔。滔滔江水不仅养育了我们，而且给了我们的思考和写作一种豪情，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极目楚天，云蒸霞蔚，我们希望“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成为一座沟通中外的桥梁，八方朋友在这里会聚，大家互相倾听，互相交流，享受思维的快乐，放飞心中的梦想。

胡亚敏

2008年2月

序

近年来海外汉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许多大学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相关论著不断涌现。这对于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件大好事——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关起门来做学问，不大关心别人在做什么，特别是像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论）的研究，很有一种惟我独尊的味道，仿佛旁人的研究都是歪门邪道，至少算不得正宗。现在人们愿意并有机会正视一下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了，这对于改造、扩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激发发现新问题的兴趣，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很大助益的。但也随之出现了另一种现象：有些学人倒是放下了“正宗”的架子，却又变得惟别人的马首是瞻了——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到话语形态都是跟着海外学者走，人家说张爱玲、钱钟书的小说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讲“审美现代性”问题，我们也跟着讲，等等。上述两种对待海外汉学的态度都是有问题的，面对海外汉学，我们这些中国本土学者既不能自以为是，也无须妄自菲薄，而是应该采取一种平等对话的态度。至少我们应该能够自行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只会跟在人家后面摇旗呐喊。应该说，对于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以一种尊重的同时又带有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取其长而弃其短的论著，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在我看来，韩军的这部《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就属于这类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韩军的这部著作选取了近年来在国内中国诗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五位海外学人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见

解、研究方法与特色进行了准确的介绍，同时以一种对话的态度对他们的许多观点提出了商榷。这就使得这部论著具有一种探索的风格——既不是对现成的观点进行一般性评述，也不是按照研究对象的逻辑去思考，而是从自己的固有立场出发去审视对象：发现其价值，指出其偏颇，暴露其悖谬。因此这部论著就具有了某种非研究对象本身所能提供的很强的启发性，这可以说是评介性论著的高境界了。此外，该书还有三点值得称道之处：

其一，善于抓住研究对象的核心问题。该书所论及的五位海外学者都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人物，如果面面俱到、巨细不分地进行评述，那是很难想象的。韩军在这里体现出一种敏锐的选择的眼光：他用很多篇幅来谈论的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对中国诗学研究最有意义的问题。其论刘若愚，是抓住他“借鉴西方文论的观念、方法和框架，但又反对那种简单的挪用和套用，同时也不同意拘守于中国传统诗观，立足于中国诗学的学术背景，他前后一贯地立足于诗学与文化构成的根本语言层面来进行中国诗学批评方法的建构，并将之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研究加以结合，以寻求中西诗学观念之间综合与运用的途径”这一特点；论叶维廉则是抓住其“有一个立足于‘五四’传统、道家美学而与西方文论进行持续对话乃至反思的过程，他对于文化模子、传释学以及道家美学的系列阐发，某种程度上确实成为他自身比较研究中的‘寻根’过程，并在与西方文论的交锋中，以文化的批评反思姿态，来呈现他所说的中国文论诸如‘打破框限’、‘恢复活泼泼的生命意识’等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一种核心观点；对于叶嘉莹是围绕她“在诗歌文本解读中能发挥中国文论传统中‘知人论世’、‘兴发感动’以及文学史的比较与呈现等诗学遗产，更在海外讲学过程中形成了化通西学的独到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她既能对于传统诗学、词学做深入的阐发，亦能观照到传统文论作为理论话语所存在的某些层面的不足”的学术特色；论宇文所安则给出一个恰当的定位：“宇文所安

典型地体现了那种立足于文本分析而走向理论探索的欧美传统在中国文学、文论领域的丰富发现，他的唐诗史研究中的内部视野确实能够给予以往文学史研究诸多借鉴，而其‘语言’模式的不足所带来的学术转向，在为他开启了新的学术可能性的前提下，也需要以必要的批评态度来看待他的具体研究”；论于连则主要揭示其运思理路：“于连的学术身份较为复杂，身处哲学家与汉学家之间，他建立了独特的由‘迂回中国’反观希腊哲学的学术策略，在他看来，那种互为外在的理论对视，可以使他直接探寻到双方思想的‘原始皱褶’处，并从双方思想之从来未被思考的成见的剖析中，来开启哲学思考新的可能性。”

其二，在评介研究对象的某种观点时具有比较的视野。例如在论述刘若愚试图将中国诗学系统化的尝试时，该书不仅引述并分析了黄庆萱、叶维廉等人对刘氏的评论性文字，而且征引了李壮鹰、陈良运以及复旦大学研究群体的相关论点来进行比较，这就把刘若愚的观点置于一种多维的关联之中来考察了，其优劣得失便可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又如在论及宇文所安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评价时，引述了钱钟书和郭绍虞等人的相关论述进行比较之后指出：“大致可以说，钱氏所提供的是‘正’的对于严羽论述中合理因素的发掘，宇文所安提供的恰恰是‘反’的有关文本歧异的拆解。两者之间的相互参照，正可以为中国文论的理解打开更为广阔的视域。”这是很公允也很有深度的见解。

其三，语言的洗练与晓畅。当下很多人写文章只重视观点而不注重文字工夫，更有一干人还故意把话说得云山雾罩，并美其名曰：具有思辨性的学术话语。古人有以艰涩文浅陋之说，正此之谓也。韩军有很好的文字功底，能作古体诗，这在他们这一代学人之中也是较为少见的。他在遣词造句上很讲究，因此用词精审，语句简洁明快，读起来可以获得某种纯形式的享受。

韩军尝在我这里访学一年，随之又读博三年，在此四年中，我

们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切磋琢磨，相知甚深。他为人的厚重诚笃和为学的精益求精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毕业后他到我的老朋友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那里做博士后，在胡教授的督责之下，学问日益精进。出站后留在那里任教，华中师范大学的文艺学专业历来为国内同学科中的学术重地之一，人才济济，成果丰硕，韩军置身其中，可谓得其所哉。相信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的浸润及师友们的奖掖提携之下，一定会有更大进步的。

李春青

2009年元月24日于京北京师园小区

目 录

引言：欧美汉学界中国诗学研究的引介与反思	1
第一章 朝向综合的诗学之路：刘若愚中国诗学研究述评	19
一 “跨语际理论家” (an interlingual theorist)	20
二 语言分析与批评的中国诗学研究	33
三 中国诗学系统化的尝试	46
四 朝向综合的诗学之路	61
第二章 “为了活泼泼的整体生命”：叶维廉中国诗学研究 述评	69
一 由充满“游子”意识的现代诗人到比较诗学研究 学者	71
二 中国诗的语法与表现·“具体经验”·道家美学	77
三 “模子”理论：寻根的理解、同异全识、互照互映	92
四 传释学：在传意和释意之间	100
第三章 生命与学术的交辉：叶嘉莹诗词批评及诗学研究 述评	111
一 辗转人生与学术理路的形成	112
二 在兴感与解析之间：融通中西的诗词批评实践	116
三 古典诗学研究：《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138
第四章 他山之石的搬运者：宇文所安中国诗学研究述评	152
一 以持续的反思提供另外的可能性	152
二 唐诗史研究中的抽象性及其批评	159

三	“文本化”与“中国文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172
第五章	迂回与进入：弗朗索瓦·于连的中国研究述评	196
一	由“外在”寻求哲学的突破	198
二	中国：由“无关”（indifférence）到相关	204
三	文本的哲学阅读与概念之网	213
四	哲学的傲慢	220
第六章	双向反观与返本开新	231
一	多元文化生态与中国诗学	232
二	“跨语际批评家”、文化认同及研究取向	246
三	语言问题与中国诗学研究方法	252
四	总体理论意识的确立	270
主要参考书目		274
后记		282

引言：欧美汉学界中国诗学研究的引介与反思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欧美汉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研究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从译介、介绍、研究的情况就可见一斑。其一，译介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其中均有涉及中国文学、文论的研究论著，这其中，又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由刘东主编、乐黛云等编选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和《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最具代表性。除此以外，某些海外学者的系列研究著作也得以引介出版，如河北教育出版社于 1997 年推出了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十卷本（该系列于 2008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中华书局于 2008 年也推出了《叶嘉莹说诗讲稿》等“说诗”系列；刘若愚的八部英文著作中，《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跨语际批评家》、《中国文学精华》、《中国之侠》等几种也先后被翻译出版，其中，如《中国文学理论》等更是有多种译本；安徽教育出版社于 2002 年推出了十卷本的《叶维廉文集》；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著系列也由北京三联书店陆续翻译推出，等等。其二，在大量资料性、介绍性的汉学著作中，也提供了不少相关学者和研究著作的信息，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翻译本《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博士文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学勤主编的译论性著作《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汉学漫步》，等等。其三，就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如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赵毅衡的《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92）、施建业的《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1993）、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王晓路的《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3）等等，都分别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以及海外的中国文学、文论研究做出了不同层面的发掘，而且有些著作已经涉及中西诗学比较的较为深入的学理层次。

这种大规模的引介和研究，自然都少不了中国学界自身的相关需求。这除了伴随着当前跨文化、跨语际交流日益频繁而需要对西方汉学发展有所了解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通过借鉴海外学界相关研究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已有成果，来深化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工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这项工作也和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借鉴西方的脉络和轨迹有内在的应合之处，是要借他者的眼光来促进自身研究中诸如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进一步更新与发展。这一点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序”中就有明确的传达：“这套丛书可能会加深我们 100 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

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①如果说这段话对为何引介的话题做出了明确回答，那么对引介之后的相关问题也需要有清晰的判断。对于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它所关联的中国文化的特定内容，我们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将现成的拿来或者挪用，更为深层的学理探研也是使之真正内在于自身研究的前提。就此而言，特别是就中国文学及文论研究的专门领域看，目前国内除了周发祥、王晓路等极少数学者有过专门深入的涉猎外，大多数出版物依然是零星的，而且主要关注于流传情况，必要系统的专项研究相对仍较为缺乏。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语言、资料以及海外中国古典文学、文论专业研究的兴起较晚等客观因素，恐怕也与中西方文论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跨文化、跨语言研究所要面对的复杂情状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停留于引介和资料、观念的梳理，显然与上述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而且，进一步从研究的相关性来看，中国古典文学及文论自学科建设伊始，就已然处于一个中西文化不断交汇、影响及探索的过程之中，即使是那种宣称限定于中国传统文献内部的考证式的做法，就其学术渊源来看，除了有对乾嘉之学的考据传统有所继承外，也没能脱离近现代以来梁启超所说的那种“科学精神”的诉求以及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更遑论诸种借鉴西方理论模式而对中国文学、文论所进行的择取、抽象和阐释。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面向西方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是中国学界中曾经产生了像王国维、钱穆、闻一多、陈寅恪、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这样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他们以自身深厚的传统学术素养，以“理解之同情”（陈寅恪）、“温情与敬意”（钱穆）的态度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中，从而为中国学术创出目光独具的打通中西的研究范式。他们的研究不但可以在切近传统的意义上成为我们由今返古的

^① 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有效借鉴,而且也可以在切近现代的意义上成为我们当下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另一方面,杜维明有关“传统”的认识也需获得足够的重视,他指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的历次“反传统”浪潮,已然构成了今天的文化中与古典传统相互激荡的多重“传统”^①。受此影响,不仅出现了以潜在的“进步”、“发展”意识为名而展开的对于西方学术浪潮追新逐后式的“拿来”,出现了“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的不乏现实功利色彩的过激思潮,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我们当下与中国古典传统之间日益深刻的语境疏隔。于是乎,也才出现了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对于观念、方法和框架的持续不断的讨论,中国文论研究更是在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弥漫着某种焦虑。这是因为,中国文学、文论的建设虽然形成了特定的系统知识,术语、观念之梳理也愈益清晰,不过在日益学科化以及抽象化的过程中,相关研究如果不能真正深入到历史、主体、语言的地基,便会愈益丧失其间那些具体、鲜活以及富于实践意义的成分。鉴于以上诸般情况,中国学界也已经展开了多个层面的学术史的整理乃至反思工作,即以文艺学界“失语症”、“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等诸般说法为例,其中所表征的除了面对西方文论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话语强势时所感到的文化焦虑,更重要的就是思考如何从中国文论的自性出发,以现代学术批评意识,通过整理、反思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论学科和研究范式的建设过程,来进行沉实有效的学术探索,最终使中国传统的丰沛资源重新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正如古人所谓“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郑樵)、“分其宗旨,别其源流”(黄宗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②,这种学

①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26页。

② 以上所引分别见于:郑樵(渔仲,1103—1162)《通志总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黄宗羲(南雷,1610—1695)《明儒学案原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章学诚(实斋,1738—1801)《校雠通义》。

术流变的自觉研讨，正具有返本开新、继往开来的深远意义，只是相对于古代学术流变的梳理，当下的任务因为面对了中西之间的对话交流而有了更为复杂的面向。

这里选择“中国诗学”作为题目，也正是考虑到“诗学”一词对于该复杂面向的某种表征作用。从习惯上的用法来说，“诗学”在中国传统中就是指作诗论诗的学问，如唐郑谷《中年》诗：“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所谈就是对于诗歌认识上的加深；陈衍《沈乙盦诗序》：“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学”和“功”相对，大约相当于习惯上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所以朱自清在《论诗学门径》中，就综括这套学问说：“本文所谓诗，专指中国旧体诗而言；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而言。”^①又因为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中国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大约也就是这套“诗学”，是为义项1。而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西方“诗学”（poetics），就希腊文的词源意义来说，本身就含有更为宽泛的“创制”含义，创制的技艺本来也包括制作实用物品，而“诗”的创制，则指一切艺术创作。“诗”作为创制知识，不同于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它是以塑造形象的方式，再现特殊事物，从中显示普遍的意义^②。而诗学就是研究艺术即创制知识的学问，这包括艺术的本质、形式和规则等话题，话语方式则具有内部抽象、系统逻辑的理论色彩，是为义项2。义项1、2

① 朱自清：《朱自清说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以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来看，已经体现了个中丰富的蕴涵。准确地说，“模仿”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乃是指对于现实的一种复杂的中介处理：就模仿所用的媒介来说，包括文字、色彩、乐器和舞蹈等；就模仿的对象来说，是对可作为模仿对象的事物的严格筛选，比如悲剧是对人物行动的模仿而非性格的模仿，这个方面后来深刻影响到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就模仿的方式来说，也有作者的在场、缺场或纯戏剧性再现之间的区别。参见[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4页。

之间的异同并非此处着力讨论的重点^①，我们注意到，将两个“诗学”并置一处，就不能不涉及以下将要讨论到的作为跨语际研究中的翻译、比较及对话等话题。而且欧美的中国文学、文论研究在这两个“诗学”之间的交叉，还产生了某些新的研究取向：一种就是运用义项 2 的“诗学”对于中国诗歌所展开的批评式的分析研究，在区别于中国固有的义项 1 的意义上，不妨视之为义项 3；再一种则是在中国诗歌、诗学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试图结合义项 2 的视野、方法和框架，从中来建立某种新的诗学理论，不妨视之为义项 4。而这些表现在不同的学者身上，还有可能出现研究中基于不同处境、不同立场、不同方式的这样或那样的结合与分离，而这不同的结合与分离又部分地形成了学者各自的学术个性，呈现出他们各自跨越学科、跨越文化的积极思考，就像后面个案研究中所要讨论的几位学者来说，他们对于以上几个义项就多少都有所涉及。这些新的特点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于中国文学、文论研究的开拓和它们可能存在的不足，对中国学界也正具有诸多可供相互观照抑或需要反思的层面。

就此而言，虽然说目前学界涉及海外中国诗学的必要系统的专项研究相对较为缺乏，不过在相关研究中，特别是从共同归属的“汉学”（sinology）这一领域来看，还是有诸多可以借鉴或者需要继续加以深化的成果。

第一，在大量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著作中，除了对于海外汉学的历史、现状以及汉学家的情况加以介绍外，也说明了中国文学及文论专业研究在欧美学界兴起较为晚近的原因，那就是，汉学研究自 17 世纪传教士来华以后逐渐形成规模，他们对于中国的兴趣和研

^① 关于这个话题，也有学者做过专门探讨，如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版）就曾做出两者之间不可通约的判断。对此，也还有其他见仁见智的看法。